

外交知识和技巧

苏·阿·科瓦廖夫 著





外交知识和技巧

[苏]阿·科瓦廖夫 著

王海燕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Ан. Ковалев
АЗБУКА
ДИПЛОМАТИИ

4-е изд. — М.:Международ, отношения, 1984

根据苏联国际关系出版社1984年第4版译出

责任编辑: 赵慧如
封面设计: 张兴升

外交知识和技巧
〔苏〕阿·科瓦廖夫 著
王海燕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7.25 字数: 179000

1989 年12月第1版 1989 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2-0264-8/D·34 定价: 2.80元

ГДА 85/34
03

译者的话

本书是根据苏联国际关系出版社1984年第4版翻译的，原书名“АЗБУКА ДИПЛОМАТИИ”。作者阿·科瓦廖夫是苏联老资格的外交官。他于1948年毕业于苏联培养外交人材的最高学府——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59年曾随赫鲁晓夫出访美国，历任苏联外交部第一欧洲司司长、部务委员、外交部副部长、第一副部长等职。

原书名中的“АЗБУКА”一词，本义是字母表，引伸开来可以解释为某一学科的初级知识。从这个角度看，书中对如何起草各类外交文件、参加不同级别外交谈判、当代外交官应具备的素质等问题的阐述，的确属于初入外交界的新人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同时，作者还以较大的篇幅深入浅出地阐述苏联当代外交的艺术和技巧，许多观点是对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苏联国家外交实践的理论总结。这些显然又不是停留在ABC水平上的基础知识。因此，我们将中译本的书名定为《外交知识和技巧》。

我们知道，论述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实践的书籍已有许多，影响较大、国内已有译本的有萨道义的《外交实践指南》、尼科尔森的《外交学》等，而系统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实践的书尚不多见。科瓦廖夫在书中不仅向读者介绍了苏联在外交实践方面所遵循的一些成规与惯例，而且还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外交与资本主义外交的不同点，这尤其难能可贵。

作者对苏联当代外交多有褒奖，这一点是显见的。另一

方面,对资本主义外交理论与方法的批驳,有些观点尚不能完全以理服人,举例亦多有重复;结构上显得有些松散,对此,我们作了一些删减。特此说明。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仍恐未能尽传原作韵致,粗疏之处尚希专家读者指正。

译 者

1988年4月6日

于外交学院

目 录

何为“新外交”.....	(1)
办公桌旁的外交.....	(19)
两个针对性.....	(31)
理想的表达.....	(43)
外交中语言的分量.....	(54)
文书格式.....	(70)
内核.....	(81)
论证部分.....	(100)
陈述事实部分.....	(115)
外交文件的语言.....	(122)
如何起草外交文件.....	(142)
谈判和访问的最后文件.....	(150)
外交官，外交官.....	(166)
谈判与缓和.....	(196)

“外交官，
外交官。
站在
世界
最前沿！”

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①
《献给我们的外交官》

何为“新外交”

每个国家都有其各自的社会环境与习俗。每个人也由于其社会地位、所受教育和习惯的不同而依照不同方式开始他们各自的一天。然而，无论在哪儿，作为新的一天的开始，人们往往首先要了解新闻。

当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里出现了军事威胁——无论是欧洲中部还是非洲丛林，是地中海黛绿的波涛里还是亚洲广袤的平原上——无疑都会引起亿万人民的警觉和对使国际局势复杂化的肇事者的愤慨。相反，人们对最初达成的某些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多少能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协议，对某些能遏制军备竞赛的一致性措施，对某些能够阻止侵略势力阴谋和殖民主义意图的行动，都会发出强有力的、一致赞同的声音。要求在和平共处、保障各民族人民和平的未来、自由和独立的基础上更认真地、坚定地改善国际局势，变革国际关系的

① 罗伯特·伊凡诺维奇·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932— ），苏联著名诗人。代表作有诗集《城市之声》、长诗《二百一十步》等。——译者

呼声正日益高涨。

新的一天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呢？在邻国或远隔千山万水的国度里发生的某些事件会产生什么结果？能否寄希望于在日内瓦湖畔或在纽约联合国大厦里举行的谈判？国家领导人之间刚刚举行的会晤和访问能否给国际生活带来新的转机？北约会议制定出的一些计划意味着什么？空降兵和海军陆战队的调动，航空母舰和潜水艇在它国海岸附近游弋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人们不断从新闻节目、报刊报道和文章中，从电台和电视评论中寻求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

在大量的国际新闻中，各国，首先是大国所表现出的每一立场尤其令人瞩目。人们对官方人士发出的照会、信函、备忘录、声明反复进行研究、分析、比较……人民渴望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真相。在过去的时代里，外交活动被裹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它只能引起少数社会特权阶层的兴趣，今天，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民不仅要求在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活动如何实际服务于和平与社会进步的目的等问题上作出自己的判断，同时也要求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对国际事态的发展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资产阶级有关对外政策问题的书籍中，常见有“老外交”和“新外交”这样的字眼儿。的确，与塔列兰^①和俾斯麦^②时代相比，近50年间，外交活动在方式方法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这样为外交下定义并不科学。因为它抹杀了事物

① 查理·莫里斯·塔列兰（1754—1838），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曾历任主教、拿破仑一世政府和路易十八执政初期的外交大臣、驻伦敦大使等职。——译者

② 奥托·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国务活动家与外交家，顽固的保皇党人。——译者

的本质,即不同国家外交的阶级性。尽管如此,围绕“新外交”所展开的争论还是具有十分鲜明的社会针对性的。以尼科尔森^①著名的《外交艺术》一书为例,就不难说明这一点。这是一部极有分量且专业性极强的著作,被译成世界许多文字。

尼科尔森将凡尔赛和约时代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誉为“新外交”之父,并称“新外交”为“美国方式”,以区别于“老外交”的希腊、意大利和法国方式。

尼科尔森抨击了威尔逊总统所谓“14点”中的第一点,后者在这里宣称“外交必须开诚布公地进行”。作为传统外交方法的卫道士,尼科尔森也许是由于唯恐涉嫌过于直率,因而才举了威尔逊总统的“14点”,而不是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份外交文件,即《和平法令》。众所周知,正是这份法令有史以来首次表述了“在所有人民面前完全开诚布公地举行一切谈判的坚定的愿望。”^②苏维埃政府随即以具体事实实现了向外交新方法的转变:苏维埃政府公布了沙俄和临时政府的秘密条约与协定。

1917年11月22日,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关于公布这些条约和协议的文件中指出:“取消秘密外交是对人民开诚布公的、真正民主的外交政策的首要条件。苏维埃政府把实现这一政策作为自己的任务。”^③

不,尼科尔森不是在批评美国外交,而是把矛头指向苏联外交。他在批评美国总统时,是在指责由弗·伊·列宁宣布

① 尼科尔森(1886—1968),美国外交家和作家,著书125部以上。1909年进入外交部,供职达20年之久,曾参加凡尔赛和会,并在英国驻马德里、柏林和德黑兰的使馆工作。其所著《外交学》中译本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译者

②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3页。

③ 同上,第21页。

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原则。

说到苏联外交，尼科尔森尽管指出其在国外和国际会议上的活动是“强有力的和始终不渝的”，然而他却根本不承认苏联具有本来意义上的外交特征。尼科尔森写道：“我丝毫也不打算低估苏联外交的实力和它的危险性，但这不是外交，而是另一种什么东西。”是的，以一位资产阶级外交理论家的观点，这的确是“另一种东西”。

美国教授、所谓“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的奠基人汉斯·摩根索认为，外交在当今已不再起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起到的那样明显和总是十分重要的作用了。他认为，当代外交的“衰落”和“贬值”首先是由于外交的秘密性这一特征不如从前那样受到重视而造成的。汉斯·摩根索在他的《国家间的政治》一书中得出结论说：“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就必须认真探讨恢复外交和使外交能够开展为和平服务的卓有成效的活动所必须的条件。”

汉斯·摩根索认为，从广义上讲，外交有以下 4 项基本任务：

1. 根据国家本身现有的和潜在的力量来确定本国的目标；
2. 充分估计其他国家的目标及其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可资利用的现有的和潜在的力量；
3. 判断各国不同的目标相互吻合的程度；
4. 利用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各种手段。

他还指出外交拥有三种手段：信念、妥协和武力威胁。

汉斯·摩根索写道：“外交的艺术在于根据具体情况，在这三种手段中作出恰如其分的选择。外交同时还应有效地行使其他方面的职能。在维护民族利益和保卫和平中，如果当

形势首先需要妥协时外交却强调信念，那么外交就可能遭到挫折。同样，如果在首先需要显示国家军事实力时外交却侧重妥协，或相反，当政治局势需要表现出信念和妥协时外交却注重显示军事实力，这时的外交也必将遭受挫折。”

任何外交如果只注重武力威胁，那它就绝不是“理智的与和平的外交”。为了得出这一结论，汉斯·摩根索不厌其烦地鼓吹“政治现实主义”。然而，在他对“实力政策”的论述中，“武力因素”显然居主导地位。

就汉斯·摩根索与尼科尔森而言，至少还不能否认，他们企图建立一种从观念上解释外交在当代世界中的意义和作用的方法，但是如果讲到曾任希特勒外交官的维波特·冯·布鲁歇尔的《外交的道路与歧途》一书，则实质上类似的论点在书中的表述就是明白无误地从对苏联、对社会主义世界毫不掩饰的敌对立场出发的。

冯·布鲁歇尔指出，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时，所谓“秘密外交”曾被当作一只替罪羊而遭到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因此，威尔逊总统在他的“14点”中也不得不对“秘密外交”提出批评。冯·布鲁歇尔承认，十月革命“从根本上变革了以往的观念”，并创立了“全部外交史上绝无前例的”新方法——面向大众、面向劳动人民的方法。

冯·布鲁歇尔称苏联外交是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异体”，并认为苏联外交与传统的资产阶级外交是对立的。这样，他就很自然地提出：怎样来实现它们之间的合作呢？他回答：“在目标相悖和方法迥异的情况下，这种合作无异于数学上的方圆法，周而复始。”这一结论毫无疑问地表明，这位西德作者横加指责苏联外交方法的目的是要为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宣扬复仇主义观念制造又一借口。

一些退职的资产阶级外交官尚可聊以自慰的是，“严肃外交（按尼科尔森的观点，即帝国主义大国在国际关系中居垄断地位时期的外交——作者）一成不变的原则最终必然取胜，并能够平息作为老外交向新外交过渡的标志的大混乱”。不过，曾由这些人任职的外交部在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上，倒是现实得多。这些外交部早就开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影响社会舆论，希望其对外活动在国内外得到最广泛的支持。由这些外交部门负责起草的一些外交文件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点。一般说，这些文件是可以公开，或至少以后可以公开发表的。无论所谓“古典外交”——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卫道士们怎样呼吁恢复“秘密外交”，怎样诅咒“扩音喇叭外交”、“电视外交”，但是，他们的呼声却越来越微弱，也越来越无人理睬。苏联共产党纲领指出：“在新的历史时代，人民群众积极干预解决国际问题的可能性无比地增大了。各国人民愈来愈积极地把解决和平与战争的问题掌握在自己手里。”^①

最近几十年来，一些颇有远见的资产阶级学者也在不断地探索重新看待外交的方法与实践，以适应今天的现实，尽管一些固有的观念因惯性作用仍表现在他们的著述中。在这方面，加拿大著名国务活动家莱斯特·皮尔逊^②所撰写的《核时代的外交》一书具有一定的意义。

作者的基本观点是，在拥有地球上1/3以上人口的地区，

① 《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422页。——原注

② 波尔兹·莱斯特·皮尔逊（1897—1972），加拿大前总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28年进入外交部，历任驻美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译者

社会政治性质的转变,以及通讯手段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外交的活动与方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皮尔逊认为,在核武器时代,国家间的关系和实施对外政策的方法本身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首先反映在政治与外交相互交叉及其职能兼收并蓄这一趋势上。皮尔逊不同于许多死抱住“古典外交”教条不放的西方学者,他直言不讳地讲到,外交也有着宣传职能,在当前,注意在其他国家宣传本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为建立友谊、友好的政治与互利的经济关系而创造良好条件,这些可以是外交宣传职能的后果。为实现这些目标,必须接触群众。皮尔逊还指出,一名好的外交官也永远是一名宣传家,换句话说,是一位观点与见解的传播者。《核时代外交》一书中还指出:宣传的手段与方法以及同社会舆论界的交往在今天比以往更为有效,听众的范围大大扩展,已包括了当今世界所有的人。

以上是一个有关“新外交”特征的比较完整的概念。然而,如果不提到皮尔逊以下这样一段论述,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仍不全面。皮尔逊说:“实际上,谈判的目标与形式是与我们军事实力同等重要的显示力量的成分。我们往往忽略这一点。如果我们的装备陈旧,我们手中的武器是刺刀而不是导弹,就会有人很快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倘若我们外交的目标是错误的和缺乏远见的,或我们的策略是软弱和畏葸的、轻率和危险的,那么总可以找到掩盖这一点的途径和办法,总会想出一定的遁词。

“外交或政治上的缺陷可以隐盖在铁幕、天鹅绒幕乃至美丽词藻的背后,从而使这些缺陷的消极影响长期不为人知。借助大胆的宣传,甚至挫折也可以转化成表面的成功。各国领导人之间在社会舆论注视下举行的会谈应以排除受挫的可能

性为目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皮尔逊得出结论：“这就是外交谈判理应关起门进行的原因之一。”

然而，资产阶级外交为何又要部分地采取“公开外交”的做法呢？这是帝国主义国家外交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拟态”。由于在资产阶级外交赖以活动的世界上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革，各国劳动人民拥有越来越大的参与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权力，因而资产阶级外交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改弦易辙，涂上一些伪装的色彩。

为了革新包括美国外交在内的外交方法，美国学者约翰·哈尔在其《职业外交官》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看法。他明确得出的结论认为，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外交的传统方法丧失了效力，当今外交的基本特征是在它认为合适的所有地方施加自己的影响。

约翰·哈尔写道：“当今外交的特征是，不仅国务活动家，人民大众在国际关系中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强调说，“不仅在情报收集或开展经济援助方面，而且在传统外交活动中也要面向人民群众，除重视执政的政府外，还必须对许多势力、派别和当地的一些利益给予极大的关注。”

著名美国政治学家约翰·斯托辛格在其《国家的强盛》（纽约，1975年出版）一书中谈到摩根索关于外交的四个组成部分时认为，过去，外交曾经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关于在“众目睽睽”之下举行会谈的问题，斯托辛格也表现了其他西方学者所表现出的疑虑。他认为，回避在公众场合露面；不为因其立场的转变而“可能会被同胞们斥责为怯懦或者是在敌人面前退却”而担忧，这对一名外交官来说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斯托辛格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外交便成了公共的祭品。妥协也成了一种例外，而

不是规则了”，因此，“参加会谈的人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同公众打交道，而不是同会谈的对手打交道。”

同时，斯托辛格毫不怀疑，“老外交的许多最有效的方法对解决当今问题作用不大。”不仅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且还因为：“科学技术以及信息手段的飞速发展，大大改变了外交的性质”，这一进程是无法阻挡和不可逆转的。作者认为，“毫无疑问，仅仅归咎于外交往来的贬值，甚至首先归咎于公开外交的弊端，都过于简单化。”

为了客观地评价公开外交与秘密外交的长处与不足，斯托辛格认为，必须视“每一具体情况的需求”和特殊性而对它们区别看待。

斯托辛格总的认为，“外交官的职业远远没有过时。一切问题在于，对这一职业的要求更严格了，外交官要在更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活动。”

留恋国际事务可以不受社会舆论监督、可以在人民背后进行的那个“美好过去”，这就是一些资产阶级权威们针对“新外交”发出叹息的主导思想。以下这段由一位敏感的记者采写的夹叙夹议的新闻报道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1963年底，法国政府将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送往美国展览。为此，它采取了在此情况下所应采取的一切防范措施。众所周知，“蒙娜丽莎的微笑”至今仍使艺术家和绘画爱好者们迷惑不解，争论不休。蒙娜丽莎的微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记者们认为，“蒙娜丽莎”千里迢迢从罗浮宫来到美国国家画廊，是因为约翰·肯尼迪总统与他的家人十分喜爱达·芬奇的这幅作品，而戴高乐将军则希望以此表达他对法美关系不断扩大的裂痕的关切。著名美国记者赖斯顿就“蒙娜丽莎”

在美国首都的出现，发表了一篇有关“新外交”方法问题的小品。他在1963年2月10日的《纽约时报》上写道：“精湛的艺术今天已成为新外交的工具。而且，几乎所有一切——艺术、工业展览和交易会、交换留学生、体育比赛、巡回演出的歌手和芭蕾舞演员，实际上都成为新外交的工具。”

赖斯顿继续写道：“外交手法也和其他一切手法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据最近发生的事件判断，这种变化并不总是向好的一面发展。在老外交时代，如果政府转而重视社会舆论，这一做法会被视为极其庸俗。外交在当时是关起门来进行的，需要职业技能和精确性。而现在，外交却通过电视来播放。”美国记者赖斯顿和英国外交家尼科尔森的观点是多么相似！

赖斯顿感伤地承认：“接连不断的战争、暴乱与大规模流血事件证明：旧体系是有缺陷的。然而，新外交也丝毫未能证明它的优越性。摒弃‘秘密外交’之后，我们转向了报纸标题的外交，这样我们同时也就丧失了做为老的职业外交官所特有的那种对事事处处都怀疑的态度和冷静的客观性……天晓得，当‘蒙娜丽莎’身处华盛顿时，她是不是在嘲笑这一点呢？”

我们姑且让赖斯顿继续他对蒙娜丽莎神秘微笑的思考。说到外交，它的形式与方法的确正在不断变化、更新，历史不仅嘲笑那些不希望看到这些变化与更新所具有的不可逆转性的人，而且还会把他们彻底甩在历史车轮的后面。

有人会问：社会主义国家不赞成“秘密外交”，是否意味着它主张在国际关系中没有丝毫机密性，没有保守机密的必要呢？不是，如果这样理解社会主义外交活动的性质，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因为这一活动是在一个多样化的、与社会主义理想还相去甚远的世界上展开的。在这里，社会主义国家、

正在探索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存在，而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外交带有剥削社会的一切无法调和的矛盾的烙印。因此，新闻界在报道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官之间举行的谈判、拜会和会晤时，才使用“对双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样的提法。也正因为如此，才存在连接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克里姆林宫与爱丽舍宫、克里姆林宫与英国首相官邸的非公开和极为秘密的“热线”通讯线路。当然，政府之间现在和将来仍需要不断交换信函、照会和其他外交文件，这些文件有公开的，也有机密的。否则就无法预先了解对方是否有达成相互谅解的诚意，难以就达成有利于巩固和平的协议取得一致意见。

米利·康邦^①在他的《外交官》这本写得非常成功的书中说得好：谁提出“要谈判”，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提出“要达成协议”。

在多数情况下，协议和协定是双方让步的产物：每一方都迎着对方走自己的路。因此，在协议上签字之前，谈判双方的代表都竭力弄清楚对方对该协议感兴趣的程度及打算作出的妥协。

我们用公式解释一下这一点。“A”点与“B”点是双方的出发点，即双方来参加谈判时带来的建议。

A—————B

如果谈判双方都寄希望于谈判取得成果（经验证明，帝国主义国家并非总是抱有这种愿望），而且根据力量对比，他们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指望另一方让步，那么双方就都没有在“A”点或“B”点上达成相应协议的希望。只有当双方在处

^① 米利·康邦（1845—1935），著名法国外交家，曾任驻华盛顿、马德里、柏林大使和法国外交部秘书长以及法国荷兰银行行长等职。——译者